

被遗忘的女性精神分析大师： 多伊奇的女性观述评

王礼军 郭本禹

[摘要]多伊奇是女性精神分析的领袖和先驱者。她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根据大量临床经验和自身的母性经历,探究并描绘了女性心理发展的全貌,提出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人格发展观。她还指出,自恋、被动性和受虐性是女性的基本特质,并进一步翔实地阐述了女同性恋形成的心理机制。多伊奇关于女性的精神分析观点不仅促使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弥补了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忽视女性气质的不足,而且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转向,为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关键词]多伊奇;女性人格发展;女性气质;女同性恋;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 B8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6)11—0226—06

作者简介:王礼军(1989—),男,安徽六安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郭本禹(1964—),男,安徽肥西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德育心理学。江苏 南京 210097

海伦妮·罗森巴赫·多伊奇(Helene Rosenbach Deutsch, 1884—1982)是著名的女精神分析学家、女性精神分析的领袖与先驱者、精神分析教育家和培训分析师以及临床医生。她出生并成长于波兰,求学于维也纳,工作于美国。1907年,多伊奇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首次见面,标志着她与精神分析结缘;1918年,她接受弗洛伊德为期一年的正式分析,此后其个人命运便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其长达60余年的精神分析研究与教育生涯。多伊奇的一生著述颇丰,是“弗洛伊德最多产的学生之一”^{[1](P.554)},其主要著作包括《论女性性功能的心理学》(1925)、《神经症的精神分析》(1930)、《女性心理学》(1944—1945)、《神经症和性格类型》(1965)、《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神话的精神分析研究》(1969)、《面对我自己》(1973)等。她的学生和被分析者遍布维也纳及欧洲各地,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安娜(Anna Freud)、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哈特曼(Heinz Hartmann)、贝恩菲尔德(Sigfried Bernfeld)和赖克(Theodor Reik)等。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创立的古典精神分析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其对女性心理发展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种附属品。多伊奇作为早期精神

分析运动的女性代表,在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之后,提出一种独特、系统、以女性为中心的精神分析人格发展理论,致力于阐明女性整个一生的心理发展。她以“生殖器创伤”为根据提出了女性心理特质观,将自恋、被动性和受虐性视为女性基本的人格特质。多伊奇的女性人格理论无疑是对精神分析的最重要贡献,同时也奠定了她理解同性恋以及各种神经症的基础。她进一步阐述了女同性恋的形成机制,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发展了女同性恋的心理机制观。然而,尽管多伊奇在女性精神分析领域功勋卓著,但其思想贡献却被学界遗漏和忽视,不免令人扼腕叹息。因此,本文致力于系统梳理多伊奇的女性精神分析思想,并对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明确其在精神分析运动以及女性心理学中应有之地位。

一、女性人格发展观

弗洛伊德重视早期经历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多伊奇继承了弗洛伊德对女性人格发展的心理分析,但她重视女性走向成熟的过程,重点探讨女性在性器欲期后的正常心理生活,不仅强调认同在青春期女性心理人格(psychologic personality)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从“母性”(motherhood)和“慈母心”(motherliness)出发探讨成年女性的人

格发展特征。

(一) 青春前期的人格发展

多伊奇认为,人格发展是青春前期(prepuberty)最重要的生命主题,且人格发展主要体现在自我的发展上。在青春前期,儿童的自我处于发展活跃期,此时本能(主要是性本能)的能量较弱。因此,这一阶段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是自我追求成长与取得成就的内在力量和强烈欲望。儿童对父母和其他长辈(如老师)的态度、同伴关系等是影响这一时期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密切关联,认同贯穿并决定着儿童的人格发展。通常,自我的力量与认同的强度呈现负相关的趋势,自我越弱的儿童越会通过认同成人以适应外部世界。女孩的认同对象及其相应的情感关系对其人格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青春前期的女孩来说,其认同的对象主要是父母和同伴。首先,父母是女孩认同的首要选择对象,父母的气质特征以及表现出的不同形象会成为女孩人格特征的直接来源。然而,女孩在追求自我独立和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弱甚至放弃对父母的认同,并可能对父母尤其是母亲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进而转向认同家庭之外的人。例如,女孩可能会对自己的女老师产生强烈的爱慕情感,并将之解释为她具有母亲所不具备的独特特征。其次,青春前期女孩理想的认同对象通常是年龄稍长的姐姐、同学或朋友,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女孩自我的延伸,并与女孩具有相同的欲望和兴趣。在多伊奇看来,这一时期女孩对年长者表现出的认同倾向不仅是一种对现实需要的表达,即她们既希望知道他人的秘密,同时也希望分享自己的秘密和快乐;还是避免因自我无法独立且不能与周围世界建立新的情感联系所导致的认同混乱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二) 青春期的女性人格发展

青春期是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最快速且最重要的阶段,多伊奇将之界定为“女性特征”(femaleness)得以稳固确立的时期^{[2] (P. 35)}。青春期的人格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自我获得独立,并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如盲目的乐观、对幻想的追求与尝试等。青春期女孩自我的独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首先,自恋的增强。多伊奇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特殊且关键的时期,它是一种介于童年期和成年期、试图协调过去和未来的混沌阶段。

这一时期是人格发展和确立的关键期,自恋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它能够发挥一种统和力(unifying force)防止女孩因认同过多或认同混乱而无法形成统一的人格,甚或导致人格解体。女孩自恋的增强会帮助其摆脱旧的情感联系,并通过逐渐认同自身而获得自信,自信的提高使其自我得到强化。其次,情感关系的转变。女孩在青春期阶段面临着转变情感关系的发展任务,她们身处正在消失和尚未形成的两种关系之间。女孩逐渐将对外部客体的情感转向自我,具有自由支配这一自我的情感能量。至此,她们的自信增长,对自我的认同亦得到强化,自我意识逐渐清晰、明确。最后,认同的发展。尽管青春期的女性人格塑造多半是成功认同父母的产物,但女孩会逐渐将其认同对象从父母转向其他满足其要求的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心的成熟,女孩抽象的自我理想会取代外在客体成为其认同对象,进而形成稳定且统一的自我。

(三) 母亲期的人格发展

多伊奇认为,母亲期的人格发展主要表现为母性和慈母心的获得和表达。她首先明确指出,“母性”和“慈母心”是两个紧密关联但又迥然不同的概念。母性主要表现为母亲与其孩子在生理、情感和社会上的密切联系,母亲可借助一系列的母性行为(如母亲的庇护、喂养和对后代的保护等)以获得诸如存在感和永恒感等心理满足。而慈母心最初源于一种原始的、超越心理的生物情境,并与动物的母性本能(maternal instinct)相差无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经验的积累,这种原始的本能逐渐演变成一种复杂且强大的情感,即母爱(maternal love)。因此,慈母心包括“母性本能”和“母爱”两种成分^{[3] (P. 19)}。母性本能是母亲人格中的攻击性和性欲望被压抑和转移的结果,而母爱则是一种母亲与其孩子之间积极关系的直接情感表达,是母性本能成分的升华。多伊奇指出,慈母心是女性整个人格特征的明确标志,表达着母亲对儿童(无助)的情感关怀。通常,性行为、怀孕、分娩和哺乳等是母性的获得和表达的正常途径,而慈母心在实际的母性行为中直接获得满足。但多伊奇强调,慈母心作为一种复杂且高度的利他情感是心理层面上的,女性可以不借助生育便能实现这一目的,她们可通过寻求其他途径来满足或转移其慈母心,如从事助产和教育工作或进行精神创作等。

(四) 更年期的人格发展

更年期女性因其独特的身心发展特征,如月经不规律直至停止、生育功能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丧失以及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其人格发展主要在于自我的整合,并以母性的维持以及慈母心的表达为标志。多伊奇指出,更年期女性主要是通过祖母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来表达其母性和慈母心,她们若能胜任这一角色并成功实现其社会功能,便是所谓的“好祖母”(good grandmother)。多伊奇基于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进一步区分并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好祖母”。第一类是在祖孙关系中延伸其母亲角色的祖母。这类祖母将其子女的孩子当作自己最年幼的孩子,并在祖孙关系中表达其慈母心。第二类是通过认同女儿而获得“新的母性”的祖母^{[3] P.484}。这类祖母获得母性体验的唯一途径就是认同,她们常常扮演着助理母亲的角色,即帮助女儿照顾其子女,因而祖母角色并非是其自身母性的延续。第三类是自我获得整合的祖母。这类祖母的母性得到升华,其慈母心的表达亦无需特定的对象。她们不需要认同他人,其注意力不再指向遥远的目标;她们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期望家庭团结、和睦以及子孙健康、快乐;她们没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多伊奇曾言“无论一位女性经历怎样的生活,当其步入老年时,她都会相信只有体验了母性的本质才会自我实现。”^{[4] P.334}

二、女性心理特质观

多伊奇认为,自恋(narcissism)、被动性(passivity)和受虐性(masochism)是女性的三个基本特质,三者协调统一是具有女性气质的标志。它们不仅是女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女性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自恋能为自我的成长与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保护,被动性和受虐性是女性气质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她进一步指出,“生殖器创伤”(genital trauma)是女性心理特质的基础,是女性所有人格特征的根源,它是女孩因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生理器官以使其在阳具欲期增强的生殖驱力(genital urge)得以投注的结果^{[5] P.289}。

(一) 自恋

自恋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弗洛伊德从生物学的视角出发,将自恋解释为个体将力比多(libido)投注自身的结果,作为一种生存的保证,是“对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中心的

补充。”^{[6] P.152}多伊奇超越了弗洛伊德这一唯我论的解释,扩大了自恋的内涵和价值,将其视为是“那些指向女孩自我的情感力量”^{[7] P.94}。自恋作为一种重要的女性特质,它与自尊密切关联,且必须依赖于对他人(父母或其替代者)的认同。在多伊奇看来,自恋不仅是个体将力比多转向自我的结果,同时也是保护自我的工具。对于女孩来说,一方面,自恋在青春前期便已表现出来,如她们选择爱的对象具有典型的自恋倾向,即选择爱一个认同自身的同龄女孩,这是一种女孩自我的复制;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她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软弱并可能产生强烈的脆弱感,此时,自恋则起到保护作用,能够提高女孩的自尊心、进取心和荣誉感,进而有助于其形成人格同一性^{[8] P.86}。多伊奇指出,对于青春期的两性来说,自恋都起到这种保护作用。然而,青春期的男孩很快便能适应身心发展的现状,并逐渐摆脱自身的自恋倾向;相比之下,女孩则体验着矛盾的情感倾向:一方面,青春期女孩的性倾向具有明显的受虐性特征,这对自我的发展与整合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会使自我的防御增强;另一方面,女孩在青春期之后并不会摆脱先前的自恋倾向,相反,其自恋会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气质。概言之,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生来就具有自恋的倾向,自恋作为其自我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位守护者或一种自我保护的自爱。对于女性而言,自恋意味着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用以避免女性因受虐性而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倾向。

(二) 被动性

被动性是女性的重要人格特征,是敏锐的内部感知和直觉能力以及强烈的幻想等女性的独特特质的根源。多伊奇认为,被动性是女性气质中所普遍存在的中心特质,它并非意味着冷漠或缺乏性能量等,而是表现为女性对现实持有一种期待的态度,而非积极主动地寻求人生目标。弗洛伊德曾用“男性-主导-积极-攻击性”和“女性-顺从-被动-受虐性”这种独特的二元模式来描述性心理,多伊奇亦作出类似论断,指出“在所有已知的文化和种族中,都存在着‘男性-主动’和‘女性-被动’这一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只不过所表现的形式不同”^{[7] P.224-225}。她还主张,被动性是由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而女性在性行为中的被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发展和生物演变的结果。因此,要想充分理解女性的被动

性唯一的途径便是探究其性本能以及自我的发展。女性的被动性与其心理性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性的情感体验不尽相同,与男孩相比,女孩所面临的情感显得更为复杂。例如,在性器欲期之前,男孩和女孩获得满足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通过本能的直接满足以及与外部环境(主要是母亲)的互动。在性器欲时期,男孩与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出现分歧,男孩因对阉割的恐惧而尤其重视其生殖器,并表现出主动和攻击性的特征,而女孩随着生理上的成熟,其性欲中心则由先前具有主动性特征的阴蒂逐渐被具有被动性和接受性特征的阴道所取代,这意味着她们开始由主动性转向被动性。在多伊奇看来,被动性对女性发展其女性特质至关重要,且取决于女性对被动性特征的态度。女性若接受自身的被动性特征,则会发展出明显的女性气质而偏向于女性化;相反,女性若对其被动性特征持抵触情感,并试图变得积极和主动,便会产生“男性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此时,其女性气质被弱化而偏向于男性化。需要注意的是,多伊奇所谓的被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女性既有被动性的特征也会表现出主动性的倾向。

(三) 受虐性

受虐性是女性气质的基础,是女性的真实特质,表现为女性试图在自恋式的痛苦情境中寻求愉快的体验。例如,她们明知道生育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却又心甘情愿予以接受。多伊奇认为,女性的受虐性与被动性不仅如同形影紧密关联,同时还具有某些共性,如两者都是女性的生理构造以及性本能由外转向于内的结果。父亲在女性的受虐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女性的受虐性特征在其生命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便表现出来,她们在孩童时期会产生一种受虐性的幻想,如希望被父亲阉割。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女孩的攻击性倾向较之男孩会更多地受到社会尤其是父亲的压抑,这种“向内”的压抑以及女孩对父亲的恐惧会增强女孩的受虐性特征。青春期时,女孩会逐渐转变其认同和依恋的对象,即从母亲转向父亲,且父亲会逐渐外化为世界(现实)的代表,此时,女孩的受虐性倾向最为显著。在多伊奇看来,女性的受虐性特征在其性功能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总体而言,女性对生殖器的矛盾态度、生殖器创伤以及月经等,都对其性功能的受虐特征具有重要影响。她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重要

特质的受虐性并非仅起到消极的作用,相反,它在女性的性功能和生育功能中具有积极的双重价值:一方面,受虐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女性对痛苦妥协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现实;另一方面,过于强烈的受虐倾向会唤起和激发女性的防御,用以避免因过度受虐所带来的可能危险,但这种防御会使女性忽略其女性气质,进而可能导致各种女性功能的紊乱。尽管如此,此时的受虐性与因过度自爱(self-love)而导致的对痛苦异常增强的敏感性具有同样的正向作用,如女性对痛苦感到恐惧而拒绝接受任何不适感。

三、女同性恋的心理机制观

多伊奇在其女性人格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女同性恋的类型及其成因,强调青春期女孩对母亲的认同及其与同伴的关系在其性取向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女同性恋的类型

基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特征,多伊奇将女性分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缺少女性气质的女性以及女同性恋。她进一步将女同性恋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指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明显的男性特质的女同性恋。一方面,这类女性在身体结构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男性化的特征,如性器官具有两性的特征,抑或第二性征具有明显的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她们在恋爱对象的选择、社会活动以及其他诸多生活方面都明确表现出某些男性化的兴趣和倾向,如在情感生活中表现得男性化以及试图从事男性化的职业等。多伊奇认为,这种同性恋主要是生物过程的结果,且多数女性仅缺少某些女性的性特征,如丰满的乳房等。第二种是指心因性的(psychogenic)女同性恋。这类群体在生理结构上并没有任何的异常迹象,而完全是正常女性化的,其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纯粹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且在女同性恋中占据多数。

(二) 女同性恋的成因机制

多伊奇强调,青春期是决定女性性取向的关键阶段,但青春前期的女孩便已表现出同性恋的雏形。青春前期,女孩的情感对象并非是父母,而主要指向另一女孩,她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认同自身并满足其自爱(self-love)的客体作为其情感依附的对象。此时,女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恋式的爱的选择,这一关系是女同性恋的最简单、最纯真的形式。青春期时,女孩的同性恋倾向便非常

明显的体现出来,主要指向同龄或稍长的女孩。女孩之间互相表达的温柔行为具有一种性欲特征,但这一关系中的性成分通常是潜意识的。多伊奇进一步指出,青春期女孩性驱力的发展为其日后的性取向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女孩的性驱力或性欲兴趣最初或多或少地指向两性,表现出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青春期之后,女孩的这种倾向会依然存在,但其性驱力会逐渐转向同性别者,进而发展成同性恋。因此,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成年女性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都可视为是青春期体验的延续、发展和强化。

多伊奇认为,女同性恋的形成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的作用,她们在复杂心理动机的驱使之下选择其爱的对象,某些具有男子气的女性会选择异性对象,而某些被动且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表现出选择同性的倾向。多伊奇不仅强调生理因素在同性恋中的作用,还重点探讨了女同性恋形成、发展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并在早期的母女关系中探究心因性女同性恋的根源。在她看来,对于女性而言,母爱是一种特有的“恩惠”(favor),但当这一“恩惠”受阻即母爱未获得满足时,女性便会寻求并建立与其他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以作为早期母婴关系的替代,并在这一新关系中获得满足。因此,与母亲保持统一的强烈欲望是女同性恋的根源之一^{[7] (P. 353)}。当女孩体验到被他人(如兄弟姐妹)抢走母亲的威胁时,她便产生怨恨和罪恶感,进而点燃其同性恋的特质。多伊奇强调,即使是正常发展的青春期女孩,在三角心理关系中,其隐藏于潜意识中的性欲指向同样会在两性之间摇摆不定而难以抉择。与此同时,女孩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情感并唤起自身的防御,她通过认同变得与父亲一样强大且具有男子气,这种源于恐惧的认同是同性恋的常见动机。此外,多伊奇还指出,女孩的同性恋倾向通常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即女孩先前被动的异性恋幻想受到阻碍,尽管这一幻想会继续存在,但女孩却由被动变得主动,且通过认同而变得“男性化”而非选择一个男性对象。因此,任何同性恋的个体行为都表达着一个未实现的异性恋愿望。

四、评价

多伊奇在女性精神分析领域中功勋卓著,其女性心理学思想是精神分析学派描述完整女性心理的代表。与弗洛伊德一样,多伊奇的声誉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病人的生命故事诉诸

于文字的能力。她关于女性心理的探究因其临床观察的细致性、描绘的生动性、心理动力结构的明晰性、结论的温和性以及思想的独创性而引人注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她是精神分析运动史乃至心理学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女性一生心理发展的心理学家,但其关于女性心理发展及其特征的诸多观点却被遗忘和淹没,鲜见于中西方女性心理学的著作中。概而言之,多伊奇的女性精神分析思想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响:

第一,促使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弥补古典精神分析在女性心理方面的不足。首先,多伊奇是早期精神分析学派重视女性经验的重要代表,她不仅自身注重并致力于对女性及其心理发展的探索与描述,同时还促使并强化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问题的关注。弗洛伊德曾指出“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对心理学来说是一片‘黑暗领域’”^{[9] (P. 183-258)}。尽管他是以专题的形式讨论女性心理问题的第一人,但却忽略了诸多重要因素,且他因试图探索女性的性生活而受到女性主义者的严厉批判^{[10] (P. 13)}。多伊奇作为弗洛伊德的“忠实的女儿”,在保持对弗洛伊德学说基本忠诚的基础上扩展了后者的研究视野,被公认为“是在劝说弗洛伊德重视女孩心理发展和母亲的重要性上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1] (P. 554)}其次,多伊奇是系统阐述女性一生心理发展的第一人,被弗洛伊德称誉为“女性心理学的先驱者”^{[11] (P. 137-138)},其女性心理学思想是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她的成名之作《女性心理学》是第一也是唯一一部按时间顺序研究女性心理发展的完整著作,极大地扩展了精神分析的边界,是“迄今为止关于女性心理的最重要著作。”^{[12] (P. 251-254)}布雷尔(Marie Briehl)曾评价道“多伊奇的《女性心理学》为弗洛伊德遗留下的‘公认的不完整和零散的’女性心理作出了重要贡献。”^{[13] (P. 293)}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完整性而言,多伊奇无疑是女性心理方面的最佳补充者。”^{[14] (P. 30)}

第二,推动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转向,奠定后续精神分析运动的基础。首先,多伊奇对女性心理问题的探索,使精神分析由父系的出发点往前走了一大段路,促使后来的研究者重视女性自身的发展,以及女性经验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如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对女性的认同作出详细阐述,母性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逐渐

得以恢复和重视,精神分析内部已然呈现出女性主义的转向。“精神分析的焦点业已从过去关于父权、性、阉割和阻抗等的个人主题,转向现在关于母性关怀及其更迭变化的人际主题。”^{[14] (P.42)}其次,尽管多伊奇的女性精神分析思想是从本能和驱力模式出发,但她无疑扩展了已有的精神分析思维,对后续精神分析运动特别是客体关系学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中关于原始母子心理上的合二为一的主张,多伊奇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先见之明。她在对女孩的心理发展予以描述时,重视并强调人际关系因素(如女孩与父母或其替代者的关系),尤其是女孩对外部客体的认同的重要意义。此外,她还指出,青春期女孩的自恋获得增强,因此其发展的首要任务便是从自恋阶段向客体关系阶段的过渡。由此可见,多伊奇的诸多观点都蕴含着客体关系理论的身影,并促使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Melanie Klein)对客体和关系的探索,后者关于女性的看法亦受到多伊奇《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一书中诸多观点的影响^{[15] (P.8)}。

第三,促进了女性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心理研究理论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女性心理学的发展^{[16] (P.135)},不仅为女性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石,还“促使女权主义在理论上由外转向内,从女性的社会解放转向探求心理解放的途径”^{[8] (P.42)}。多伊奇首度开展了对女性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式解读,详细描述了女性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她本身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其论点偏向于保守的女性主义观^{[14] (P.18)}。尽管她几乎被遗忘,但其女性心理学观为女性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想埋下种子。母性本能问题是女性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方面,是女性心理学的三大主题之一^{[17] (P.35)},多伊奇在论述女性心理时重视母性的作用,将母性本能视为慈母心的一部分,这种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心理学家探讨女性心理问题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此外,她认为,女同性恋与早期母子关系中女性对女性(woman-to-woman)的依恋有关,而女性不仅具有自恋、被动性和受虐性三个基本特质,同时还具

有双性的心理特征,这与现代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和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复旦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中便明确指出,“所有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双性心理”^{[18] (P.47)},即女性同时对母亲和父亲的爱。

参考文献:

- [1] Binstock W. A. Her Own Woman, Review of: Confrontations with Myself: An Epilogue.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PA Review of Books, 1975, 20(7).
- [2] Deutsch, H. Psychoanalysis of the Sexual Functions of Women. New York: Karnac Books, 1991.
- [3] Deutsch, H.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Vol. 2.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45.
- [4] Thompson, N. L. Helene Deutsch: A Life in Theory.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87, 56(2).
- [5] Wimpheimer M. J., Schafer, R. Psychoanalytic Methodology in Helene Deutsch's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97, 46(2).
- [6] 周秀芳. 从弗洛伊德的自恋到拉康的镜子阶段[J]. 中华文化论坛, 2008(51).
- [7] Deutsch, H.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Vol. 1.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44.
- [8] 张海钟, 赵文进, 陈小萍, 糟艳丽, 李介, 王云霞. 精神分析学派与女性心理学的发展[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6.
- [9] Freud, S.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conversations with an impartial person. In J. Strachey. Sigmund Freud (Standard Edition 20).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 [10] Hughes, J. M. Helene Deutsch's Account of the Dark Continent: retrogression and female masculinity. Psychoanalytic Studies, 1999, 1(1).
- [11] Deutsch, H. Confrontations with Myself. New York: Norton, 1973.
- [12] Brierley, M. Critical review (of Deutsch, 1944-4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48, 29(3).
- [13] Briehl, M. H. Helene Deutsch—The maturation of woman. In F. Alexander, S. Eisenstein, M. Grotjahn. Psychoanalytic Pioneer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 [14] [美]珍妮特·谢尔斯. 精神分析母性[M]. 刘慧卿译. 台湾: 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 [15] Deutsch, H. Psychoanalysis of the Sexual Functions of Women. New York: Karnac Books, 1991.
- [16] 赵辉. 论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心理研究[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0(6).
- [17] 郭爱妹. 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 [18]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女性天才三部曲: 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J]. 黄蓓译.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收稿日期 2016-05-10 责任编辑 程融